

郭沫若文學在台灣：其接受過程的歷史考察^{*}

黃惠禎

聯合大學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副教授

摘要

1920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興起之際，郭沫若不但有作品被當作白話文學的範本，陸續被介紹到台灣來，其本人也與台灣作家有過面對面的接觸。1934年底，郭沫若在日本見到賴明弘時，曾對台灣文學的走向進行指導。1935年郭沫若投書《臺灣文藝》，指出增田涉〈魯迅傳〉的記載有誤，隨即引發增田涉的投稿回應，促成了台灣文壇與日本的中國研究界直接交流。爾後，因為左翼立場觸犯政治禁忌，郭沫若及其作品的介紹幾乎呈現中斷的現象，直到1987年解除戒嚴之後，終於走向全面開放的時代。

本論文主要藉由文獻史料的整理與爬梳，勾畫台灣人接受郭沫若文學的過程，以及歷來推崇與貶抑兩種不同評價背後，所反映的政治環境與文化氛圍。此外，亦考察郭沫若作品在台灣刊載，以及郭沫若有關台灣文學的發言，對台灣新文學運動和創作造成的影響。藉由台灣作家對郭沫若文學及其世界文學譯作的傳播與接受，不僅可描繪出台灣與中國新文學交流的軌跡，亦可窺見日治時期的台灣曾經以日本為橋樑，與中國知名作家進行直接或間接的交流與對話，證明台灣新文學運動確實承受來自中國、日本與歐洲等地，不同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或深或淺的薰染。

關鍵詞：郭沫若、中國現代文學、左翼、左翼文學、台灣文學

^{*} 本論文為同題名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案之研究成果，計畫編號：NSC99-2410-H-239-013-。承蒙兩位審查委員惠賜修改意見，謹在此表達由衷的謝意。

The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Acceptance of Guo Moruo's Literature in Taiwan

Huang Hui-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aiwa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Abstract

When Taiwan's Neo-Literary Movement emerged in the 1920s, the Chinese writer Guo Moruo, whose works had been regarded as a paradigm for how to write in the Bai-Hwa style (the oral Chinese language),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He had a direct contact with Taiwan's writers several times. At the end of 1934, when meeting the Taiwan's writer Lai Ming-Hong in Japan, Guo gave advi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literature. In 1935, Guo wrote to *Taiwan Literature and Arts* pointing out the mistakes in Wataru Masuda's "Lu Xun A Biography". Masuda's quick response to Guo's questions led to a direct communication between Taiwan's literati and Japanese scholars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after, Guo's works were suspended for his left-wing stance failed to agree with that of the ruling class. It was not until the Martial Law was lifted in 1987 that his works were allowed extensively to be published in Taiwan.

The aims of the article are to sort out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to outline the course of Guo's literatur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in Taiwan,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context at that time from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marks about Guo.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also investigates Guo's influence on the Neo-Literary Movement and literary creation by examining his works published in Taiwan, as well as his comments on Taiwan literature. Through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of Guo's literary and translated works in Taiwan's literary circle, the article can not only picture

the trajectory of exchange of the new literatur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but also shows that Taiwan's writers in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employed Japan as a bridge to communicate with China's important writers in a direct or indirect way. The findings of the article support the fact that Taiwan's Neo-Literary Movement is inde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e and literary thoughts from China, Japan, and Europe.

Keywords: Guo Moru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eft Wing, Leftist Literature, Taiwan Literature



郭沫若文學在台灣：其接受過程的歷史考察

一、前言

中國文學革命發軔於1917年，兩年後因五四運動的催化而宣告成功。接踵其後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為借鏡中國的發展經驗，並以之作為學習現代白話漢文創作的範本，遂於報紙和雜誌評介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及作品。1980年代以來，在本土化浪潮引領下，台灣文學研究蔚為風潮，評估中國新文學作家與台灣文壇的關係，也成為回溯台灣新文學運動發展史的重要議題。截至目前為止，相關研究以魯迅、郁達夫為對象者收穫最為豐碩。

魯迅方面，不僅已有中島利郎編《台灣新文學與魯迅》，集結絕大部份日本與台灣學界的研究成果，¹還有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²深入討論戰後初期台灣文化重建與魯迅的關係。探討鍾理和所承受來自魯迅的影響，也有張燕萍《人間的條件——鍾理和文學裡的魯迅》與張清文《鍾理和文學裡的「魯迅」》兩篇學位論文發表。³除此之外，學者陳芳明於2008年發表〈台灣文學與東亞魯迅〉，⁴綜觀魯迅文學在台傳播史；在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開設的「文學研究方法論——台灣魯迅

1 中島利郎編，《台灣新文學與魯迅》（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05）。總計收錄6篇論文：陳芳明，〈魯迅在台灣〉；中島利郎著，葉笛譯，〈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與魯迅——其接受的概觀〉；林瑞明，〈魯迅與賴和〉；澤井律之著，葉蓁蓁譯，〈兩個《故鄉》——關於魯迅對鍾理和的影響〉；下村作次郎著，邱振瑞譯，〈戰後初期台灣文壇與魯迅〉；黃英哲，〈戰後魯迅思想在台灣的傳播〉。另外，書前有葉石濤〈台灣新文學與魯迅〉一文，書後附錄方美芬編，吳興文、秦賢次補編，〈台灣的魯迅研究論文目錄〉，以及未署名編者的〈台灣新文學與魯迅關係略年表〉兩份資料。

2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12）。其內容是以《台灣文化再構築1945～1947の光と影——魯迅思想受容の行方》（日本埼玉縣：創土社，1999.09）為主，再增加兩個章節而成。

3 張燕萍，〈人間的條件——鍾理和文學裡的魯迅〉（台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張清文，〈鍾理和文學裡的「魯迅」〉（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6）。

4 陳芳明，〈台灣文學與東亞魯迅〉，《文訊》267期（2008.01），頁53-61。

學」課程，修課研究生的課堂報告陸續發表於該所附設的台灣文學部落格，⁵顯見魯迅與台灣文學關係的研究已經累積驚人的成果。郁達夫方面，2009年初羅詩雲發表的碩士論文〈郁達夫在台灣：從日治到戰後的接受過程〉，⁶誠可謂郁達夫文學在台接受歷史的總整理。

魯迅和郁達夫都是和台灣作家有過實際接觸經驗的中國新文學大家，⁷堪稱為研究中國文學革命與台灣新文學關係的絕佳範例，相關研究聚焦於兩人的情形不難理解。有趣的是同樣身為五四時期重要作家的郭沫若，不僅在日本寓所接待過來自台灣的蔡嵩林與賴明弘，1935年還投稿到《臺灣文藝》，指出該雜誌所刊載增田涉〈魯迅傳〉中，羅曼盧蘭寄到中國有關魯迅的文字，因為落於和魯迅抗爭的創造社手裡，而不得發表的記述是「莫須有的一段奇談」，附帶閱讀《臺灣文藝》2卷1號後的建議和期待。⁸刊載郭沫若文章的這期《臺灣文藝》，也刊出了賴明弘〈郭沫若先生的信〉與〈訪問郭沫若先生〉兩篇文章，內容分別為賴明弘與郭沫若於1934年11月間往來的書信，以及賴明弘專程赴日拜會郭沫若的經過。在此之前，《先發部隊》甚至刊出過蔡嵩林〈郭沫若先生的訪問記〉。⁹毫無疑問，這些都是中國新文學和台灣新文學對話交流的重要歷史紀錄。

在魯迅與台灣文學的關係已被充分討論之際，台灣文化人對郭沫若文學的介紹與接受，至今仍未有直接相關的研究發表，觸及此一議題者僅有4篇論述。楊若萍《台灣與大陸文學關係簡史（一六五二——一九四九）》，雖然跨出了相關研究的第一步，然全書僅列舉《臺灣新民報》轉載的郭沫若〈歧路〉，以及《臺灣文藝》上刊出的5篇文章，包括郭沫若與賴明弘來往的

5 詳見台灣文學部落格，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所，（來源：<http://140.119.61.161/blog/index.php>）。

6 羅詩雲，〈郁達夫在台灣：從日治到戰後的接受過程〉（台北：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7 魯迅與台灣作家張我軍、張秀哲在大陸有過接觸，郁達夫則在1936年底訪台期間會見過黃得時、吳新榮、郭水潭等重要台灣作家。陳芳明，〈魯迅在台灣〉，中島利郎編，《台灣新文學與魯迅》，頁3-37；羅詩雲，〈郁達夫在台灣：從日治到戰後的接受過程〉，頁92-95。

8 郭沫若，〈魯迅傳中的誤謬〉，《臺灣文藝》2卷2號（1935.02），頁87-88。

9 目錄題為〈郭沫若先生訪問記〉，內文部份則題為〈郭沫若先生的訪問記〉，刊載於《先發部隊》1號（1934.07），頁36-39。

信函，台灣作家黃得時、蔡嵩林、賴明弘與張深切評介或訪問郭沫若的紀錄等，¹⁰ 史料的實際意義並未進行分析。爾後，張雅惠的碩士論文〈賴明弘及其作品研究〉，藉由細密的文本分析，深入論述與郭沫若往來對於賴明弘的深刻影響，在相關研究上獲得突破性的重要發現。¹¹ 柳書琴〈臺灣文學的邊緣戰鬥：跨域左翼文學運動中的旅日作家〉則指出，郭沫若不僅對臺灣文藝聯盟有所期許與影響，並促進了日治時期中國與台灣青年的交流，尤其促成了《臺灣文藝》與日本的中國研究界之接觸。¹² 許俊雅〈《洪水報》、《赤道》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轉載——兼論創造社在日治台灣文壇〉，除列出《臺灣民報》與《臺灣文藝》的相關篇章，亦提示多位台灣作家與郭沫若的文學關係，最大的貢獻莫過於挖掘《赤道》轉載的兩篇郭沫若作品出土。¹³

筆者執行96年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時，以「中國現代文學在台灣之傳播」為中心多方蒐羅史料，從而發現郭沫若與台灣文壇頗有淵源，隨即關注此一議題，並展開相關文獻之蒐集。爾後，獲得99年國科會計畫案的經費補助，得以系統性地進行資料之蒐編與整理。本論文即是以多年來陸續搜尋所得的史料為基礎，再參考前述4篇論文提出的資料與見解，具體勾畫歷來郭沫若文學在台傳播之經過，台灣文化界對郭沫若文學的接受，以及台灣作家和郭沫若往來與對話所造成的影響，兼及日本文學界如何仲介郭沫若給台灣文壇，並剖析台灣文壇接受或排拒郭沫若文學，不同評價與態度背後所反映的意識形態、政治立場與時代氛圍。

10 這五篇文章依序為：黃得時〈讀郭沫若先生著『屈原』〉、蔡嵩林〈郭沫若先生的訪問記〉、賴明弘〈訪問郭沫若先生〉、賴明弘〈郭沫若先生的信〉、楚女（張深切）〈評先發部隊〉。楊若萍，《台灣與大陸文學關係簡史（一六五二——一九四九）》（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03），頁159。附帶說明的是楊若萍此書為學位論文改寫而成，原題為〈台灣與大陸文學關係之歷史研究（1652年-1949年）〉（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11 張雅惠，〈賴明弘及其作品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96-98及頁118、139。

12 柳書琴，〈臺灣文學的邊緣戰鬥：跨域左翼文學運動中的旅日作家〉，《臺灣文學研究集刊》3期（2007.05），頁74-78。

13 許俊雅，〈《洪水報》、《赤道》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轉載——兼論創造社在日治台灣文壇〉，《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4期（2012.04），頁189-192及頁207-214。

二、日治時期對郭沫若文學的接受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1920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蓬勃發展。由於寄望中國協助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並標榜漢民族認同，以對抗強勢的日本文化，中國白話文成為台灣新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選項。¹⁴為學習中國新文學的創作方法，不但胡適、陳獨秀、劉半農等人的新文學主張被引進台灣，魯迅、周作人、冰心、俞平伯、郭沫若、徐志摩、郁達夫、沈從文、張資平、老舍、巴金、鄭振鐸等五四時期知名作家之作品，日治時期也幾乎都有在台刊載之紀錄。目前已知，《臺灣民報》（含《臺灣新民報》）轉載中國新文學家的作品，以魯迅的9篇為最多，若譯作不計則有7篇。¹⁵郭沫若創作被轉載者共有6篇（詳如下述），與魯迅相比所差無幾；其地位與聲望，亦幾可與魯迅相比擬。

1923年間，許乃昌〈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¹⁶介紹1922年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成就時，在小說創作處提到郭沫若的名字；列舉同年間出版的重要作品時，列有郭沫若的詩集《女神》。張我軍在〈研究新文學應讀什麼書？〉中，「新詩集」首舉郭沫若的《女神》與《星空》，「雜誌」類僅列出三種，其中《創造週報》與《創造季刊》，正是郭沫若參與組織的創造社發行的刊物。¹⁷在〈詩體的解放〉一文中，張我軍甚至以郭沫若的〈筆立山頭展望〉作為「很有望的詩人、做出些真詩好詩來」的具體例證，並且評價說：「他的詩纔是現代的詩、和世界各國的新詩合致」。¹⁸1925年間郭沫若文學的刊載，除了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觀〉節錄了〈勝利的死〉最後一節外，¹⁹《臺灣民報》還刊登過〈仰望〉、〈江灣即景〉、〈贈友〉與〈夕暮〉4首新

14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出版社，1987.02），頁22；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10），頁59、76。

15 篇目及刊載情況見中島利郎，〈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與魯迅——其接受的概觀〉，《台灣新文學與魯迅》，頁49-50；林瑞明，〈魯迅與賴和〉，《台灣新文學與魯迅》，頁84-85。

16 該文以「秀湖」筆名發表，誤植為「秀潮」，〈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臺灣民報》4號（1923.07.15），頁3-4。

17 張我軍，〈研究新文學應讀什麼書？〉，《臺灣民報》3卷7號（1925.03.01），頁17。

18 張我軍，〈詩體的解放（續）〉，《臺灣民報》3卷9號（1925.03.21），頁12。

19 蔡孝乾，〈中國新文學概觀（二）〉，《臺灣民報》3卷13號（1925.05.01），頁15。

詩及小說〈牧羊哀話〉。²⁰〈仰望〉、〈江灣即景〉與〈贈友〉並列刊載時，後附張我軍對三首詩作與作者郭沫若的評論，他說：「郭君是一個熱血的青年詩人。他對於現社會的缺點、不滿、既能痛切地指點出來、又能切實地指示我們以他的理想」，²¹可謂推崇備至。

前述《臺灣民報》刊載的作品，都是郭沫若早年留學日本時期，偏向浪漫主義風格的文學創作。其中1920年發表的詩作〈勝利的死〉，歌頌愛爾蘭獨立運動領袖被英軍逮捕之後，在獄中因恥食英粟而絕食，終於犧牲成仁的悲壯事蹟。發表於1919年的小說〈牧羊哀話〉，則是藉由一位朝鮮少女與戀人死別的悲劇，訴說日本帝國壓迫李氏王朝簽訂《合邦條約》的歷史。當時台灣的處境跟亟欲擺脫英國宰制的愛爾蘭，以及同樣淪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有極為近似之處。這兩篇作品的轉載，投射出台灣知識菁英推動新文化與新文學運動，係用以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時代精神。

1930年，《臺灣新民報》以「若」之名，刊載過郭沫若的自傳體小說〈歧路〉。²²創辦於1930年的左翼雜誌《赤道》，曾分別以「坎人」與「麥克昂」的筆名，轉載了〈馬克斯進文廟〉與〈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²³其中，〈馬克斯進文廟〉虛構孔子與馬克斯交談的故事，乃用以反駁馬克斯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的小說創作。²⁴1935年5月，《臺灣文藝》刊載譯自東京《文藝》雜誌的森次勳〈中國文壇的近況〉，²⁵簡介了國民政府壓迫下左翼文學的停滯，以及郭沫若等中國作家活動的現況。同年7月，《臺灣文藝》刊出蔡嵩林〈中國

20 〈仰望〉、〈江灣即景〉與〈贈友〉同時刊載於《臺灣民報》3卷18號（1925.06.21），頁15-16。〈夕暮〉轉載於《臺灣民報》84號（1925.12.20），頁16。〈牧羊哀話〉連載於《臺灣民報》76號（1925.10.25）至78號（1925.11.08）。其中，〈牧羊哀話〉缺少第四、五小節有關子英被殺與李氏夫人自殺的情節，第六小節標號並改為五。

21 以「一郎」筆名發表，引自《臺灣民報》3卷18號，頁16。

22 分4期連載於《臺灣新民報》340號（1930.11.22）至343號（1930.12.13）。

23 這兩筆資料由學者許俊雅挖掘整理，其中刊載〈我們在赤光之中相見〉的《赤道》4號筆者未見。在此要特別指出的是許俊雅所說，〈馬克斯進文廟〉刊載於創刊號（1930.10.31）有些許誤差。筆者從中研院台史所收藏的創刊號後附「第二號要目預告」中發現，未完部分將續刊於11月15日發行的2號。參見許俊雅，〈《洪水報》、《赤道》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轉載——兼論創造社在日治台灣文壇〉，《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4期，頁189。

24 有關〈馬克斯進文廟〉的內容與意義，請參閱許俊雅〈《洪水報》、《赤道》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轉載——兼論創造社在日治台灣文壇〉的分析，《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4期，頁189-192。

25 譯文由賴明弘執筆，發表於《臺灣文藝》2卷5號（1935.05），頁22-24。

文學的近況》，文中多處提及郭沫若，包括曾經和王獨清、徐志摩並稱中國的三大詩人，並評論「沫若之所以膾炙中國青年者，也是他的事々都根據於科學手段折事實的緣故」。²⁶ 8月，黃得時在《臺灣文藝》發表〈讀郭沫若先生著『屈原』〉，旨在評論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兼及郭沫若在中國文壇，尤其是新詩界的貢獻，以及做為甲骨學世界權威的學術地位，並引用了郭沫若憑吊屈原的舊詩〈過汨羅江感懷〉。²⁷ 1937年5月，臺北高等學校新聞部發行的《臺高》，吉成新太郎〈從胡適到魯迅〉（〈胡適から魯迅まで〉）一文中，也刊出了郭沫若的詩作〈筆立山頭展望〉。²⁸ 6月，《詩報》刊出由郭沫若以五言詩句翻譯的歌德原作〈天上序曲〉。²⁹

從前輩作家的回憶可以發現，郭沫若文學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曾被廣為閱讀。例如王詩琅說他到了15、6歲左右，開始閱讀1930年代的中國文學，包括郭沫若等人的詩或小說，³⁰ 又說他從上海訂購中文圖書，創造社派每位作家的作品集幾乎全部讀過。³¹ 賴明弘在1935年2月發表的〈郭沫若先生的信〉中，自述曾在《改造》閱讀郭沫若發表的隨筆，³² 立刻寫信到改造社詢問郭沫若的地址，想奉信趨教。³³ 龍瑛宗晚年憶及1930年代，郭沫若於《改造》發表過評

26 蔡嵩林，〈中國文學的近況〉，《臺灣文藝》2卷7號（1935.07），頁191。

27 黃得時未標明詩題，所引內容為：「屈子行吟處，今余跨馬過。晨曦耀江渚，朝氣滌胸科。攬轡憂天下，投鞭問汨羅。楚猶有三戶，懷石理則那？」經查，乃作於1926年8月的〈過汨羅江感懷〉。引自黃得時，〈讀郭沫若先生著『屈原』〉，《臺灣文藝》2卷8、9合併號（1935.08），頁114。

28 刊出時以〈筆立山在門司市西〉為題，見吉成新太郎，〈從胡適到魯迅〉，《臺高》3號（1937.05），頁12。這筆資料係由日本學者河原功先生提供的《臺高》影本中尋獲，特此致謝。

29 包含〈拉費爾〉、〈甘伯列〉、〈米海爾〉、〈三人〉4首，收於《詩報》155號（1937.06.25），頁155。

30 張炎憲、翁佳音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11），頁217。

31 王詩琅在〈我的苦讀〉一文中說：「至於中文都是購自上海，『胡適文存』一二三集『獨秀文學存』『中國哲學史大綱』及三十年代文學書固不消說，舉凡小說研究會派、創造社派、新月派的每位作家的作品集，幾乎全部讀過，抗戰前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大概是最後訂購的。」引自《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頁195-196。

32 依賴明弘所言的時間點來看，這篇郭沫若的隨筆應該是〈現代支那政治家論〉，《改造》15卷10號（1933.10），頁68-76。

33 賴明弘，〈郭沫若先生的信〉，《臺灣文藝》2卷2號（1935.02），頁98。

論蔣介石的文章。³⁴ 吳新榮的藏書不僅有郭沫若著作的存在，在〈第二屆文藝大會的回憶——文聯的人們〉（〈第二回文藝大會の憶出——文聯の人々〉）一文中，還把《臺灣文藝》的編輯賴明弘給人的印象，跟俄國的高爾基與中國的郭沫若相提並論，³⁵ 顯示對於郭沫若在中國文藝運動的領導地位有所認識。1936年12月28日的日記中記載著：「同氏（指郁達夫）是魯迅死於中國和郭沫若並肩為中國文壇的重鎮」，³⁶ 1938年3月24日的日記中則有「今天開始認真地讀《支那古代社會史論》，由神秘解放出來的我，只能驚訝於作者郭沫若的偉大」，³⁷ 透露郭沫若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1939年，楊雲萍在外雙溪接待來訪的吳新榮、黃明富、林泰料、呂成寶等人時，甚至以郭沫若著作為贈禮，³⁸ 由此可見台灣作家對郭沫若之看重。

此外，賴和紀念館藏書目錄中有郭沫若的《聶婪》、《女神》、《瓶》、《後悔》、《沫若詩集》、《創造十年》、《文藝論集》、《盲腸炎》等作品，還收藏有郭沫若翻譯的《戰爭與和平》、《新時代》、《新俄詩選》、

34 筆者根據許俊雅論文中引用龍瑛宗所說：「最後，老作家想起了，昭和初期作家郭沫若以日文在《改造》上發表了乙篇精彩的〈蔣介石論〉」，翻閱原文，發現接著有「那個時候，楊達兄也去東京」的文句，依其意應指〈蔣介石論〉乃1937年在東京時所見。筆者再查閱臺灣大學圖書館所藏1937年出刊的《改造》雜誌之後，卻未找到有所謂〈蔣介石論〉之類的文章。經查龍瑛宗所見應為〈在轟炸中來去〉的第十節，日文譯作發表於《改造》時以〈蔣介石を訪ふ〉為題，刊於19卷15號（1937.12.16），頁56-59。由於1933年10月郭沫若曾在《改造》發表〈現代支那政治家論〉，主要是論述對蔣介石的印象與觀感，因此龍瑛宗可能在台灣讀過這篇文章，晚年時誤記時間點為訪問東京時的1937年。龍瑛宗的回憶見〈楊達與《台灣新文學》——一個老作家的回憶〉，原載於《文學台灣》創刊號（1991.12），收於龍瑛宗作，陳千武、林至潔、葉笛譯，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七冊隨筆集（2）》（台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1），頁234。許俊雅的引文見〈《洪水報》、《赤道》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轉載——兼論創造社在日治台灣文壇〉，《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4期，頁208之註腳64。

35 吳新榮說參加第二回文藝大會最想見到的是賴明弘，並描述了為賴明弘的出現而高興之前，聽到葉陶說他因健康因素無法出席時失望的心情，「因為他像高爾基及郭沫若似地映在我們腦子裡。」張雅惠認為：「將賴明弘媲美『俄國作家與政治活動家』高爾基，以及『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郭沫若，可能過譽卻強化當時賴明弘作為一個政治活動家與文化旗手的角色」。吳史民（吳新榮），〈第二屆文藝大會的回憶——文聯的人們〉，原以日文載於《臺灣文藝》3卷6號（1936.05），引自吳新榮撰，呂興昌總編輯，《吳新榮選集一》（台南：台南縣文化局，1997.03），頁390。張雅惠，〈賴明弘及其作品研究〉，頁111。

36 吳新榮作，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1933-1937）》（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11），頁271。

37 吳新榮作，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2（1938）》（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11），頁221。

38 吳新榮作，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3（1939）》（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06），頁196。

《魯拜集》、《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華倫斯太》、《德國詩選》等世界文學名著。³⁹ 賴和胞弟賴賢穎留學中國時，曾把在當地購買的雜誌寄回給賴和，賴和就擺在客廳，供文友們閱讀；⁴⁰ 賴和也曾親自或透過楊守愚的協助，向上海的出版商訂購圖書與雜誌，⁴¹ 其中很可能也包含了郭沫若的文學創作。儘管我們無法確知有多少進入賴和等人的閱讀經驗，但台灣作家的文學涵養中絕對佔有郭沫若的一席之地；台灣作家也透過郭沫若的中文譯筆，接觸世界性的文學創作。

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6月，少岳在《臺灣新民報》發表的〈最近的新詩與我的希望〉中指出，郭沫若《星空》的〈雨後〉裡一節，和楊華〈晨光集〉的十一很相似。⁴² 筆者將兩者比對後，確認楊華的確有仿作之跡。郭沫若〈雨後〉開頭的詩句為「雨後的宇宙，好像淚洗過的良心，寂然幽靜。」⁴³ 楊華〈晨光集〉內容為「雨後的長空、寂然幽靜、像給淚泉洗過的良心！」⁴⁴ 其中之異，在於郭詩的「宇宙」改為「長空」；「寂然幽靜」從第三句更動為第二句；「好像淚洗過的良心」與「像給淚泉洗過的良心」結構相似，後五字也完全相同，正符合少岳所謂：「除起一兩字的差異、與字句的排法不同外、內容竝無與岐（按：「歧」之誤）異」。⁴⁵ 由此可見，尚未央所說台灣文壇受郭沫若影響不淺，⁴⁶ 確實不假。

39 整理自〈賴和藏書目錄〉，賴和紀念館（來源：http://cls.hs.yzu.edu.tw/laihe/B1/b22_2.htm）。

40 黃武忠，〈溫文儒雅的賴顯穎〉，《臺灣作家印象記》（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84.05），頁66。

41 筆者向賴和紀念館洽詢調閱相關史料時，雖有張綵芳小姐熱心地協助搜尋，目前尚未能尋獲。在張綵芳小姐指引下，筆者聯繫到整理過賴和圖書的林瑞明教授，林教授表示清楚記得賴和家中的某本書中，夾有賴和親筆向上海的商務印書館購買書籍的劃撥單。另外，楊守愚1936年7月25日的日記上記載：「早上替賴和先生寫張信去對上海生活書店訂購世界文庫，和文學雜誌。」見許俊雅、楊洽人編，《楊守愚日記》（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12），頁47。

42 依毓文所言，少岳〈最近的新詩與我的希望〉發表於1935年6月7日的《臺灣新民報》，原件尚未出土，不過毓文〈就暗合和剽竊說幾句〉已引述少岳的發現，見《臺灣文藝》2卷7號（1935.07），頁199。

43 郭沫若，〈雨後〉作於1921年10月20日，收於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一卷》（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10），頁193。

44 楊華，〈晨光集（續）〉，《臺灣文藝》2卷2號（1935.02），頁120。

45 毓文，〈就暗合和剽竊說幾句〉，《臺灣文藝》2卷7號，頁199。

46 尚未央說：「臺灣文壇受本國文壇之影响姑且不說，而受中國中堅作家郁氏以外如魯迅、郭沫若、張資平、茅盾等的影响也可以說不淺」。引自尚未央，〈會郁達夫記〉，《臺灣新文學》2卷2號（1937.01），頁60。

整體說來，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界，不管台灣人或日本人，無論新舊文學陣營，都注意到了郭沫若新詩、舊詩、小說、散文、翻譯等各類型的作品，尤其是新詩方面的成就，並引為文學創作的典範。然而相對於為台灣人民喉舌的《臺灣民報》，官方支持的報刊對郭沫若的批判立場明顯有別。1925年7月28日，《臺灣日日新報》的漢文欄「趣語」刊載一則題為〈寫實派出恭新體詩〉的短文，點名「近來新體詩人。若郭沫若。張定璜。徐祖正等之作。崇拜者皆以為妙味難言。嘗記長沙張冥飛之寫實派出恭詩一章。自此詩一出。後之新體詩。皆望塵莫及矣。」後附淺白粗俗、難登大雅之堂的該詩內容，對新詩極盡嘲諷之能事。1936年8月27日，《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又刊登了一則題為〈郭沫若春聯〉的記事，以「民國革新文學家」郭沫若近來生活頗為舒綽，及其寄寓東京（應為千葉縣市川市）⁴⁷門口的春聯有「好携妻子笑蘭房」的字句，暗諷郭沫若的人品不佳。由於台灣在發展新文學的過程中，曾引發新舊文學論戰，漢文欄對「新體詩」與「新文學家」的譏嘲，與新舊文人的對立不無關係。

1937年4月，因殖民當局施加壓力導致報紙漢文欄陸續廢止，⁴⁸漢文新文學創作已失去發表的機會。加以七七事件爆發後，中國成為正式交戰的敵方，日本當局更加緊對於文壇的掌控，台灣作家對郭沫若文學的介紹隨之中斷。不過臺灣總督府官方刊物的《臺灣時報》，1940年2月突然刊載了黃得時〈中國的現代文學〉（〈支那の現代文學〉）⁴⁹，追溯了以甲午戰爭為契機，中國思想界與現代文學的發展，也說明了只能介紹到七七事件為止，係因在此之後中國出版物幾乎無法入手。主要內容則是郭沫若等中國作家的生平大要與文學活

47 2011年7月17日，筆者在當時還是東京大學研究生的謝惠貞博士嚮導下，參觀了位於千葉縣市川市的郭沫若紀念館。承蒙小出美保子女士親切接待與吉野實先生的詳盡解說，獲知郭沫若在與東京都僅一水之隔的市川市先後有過三個住家，1934年台灣作家賴明弘在蔡蒿林引領下登門拜訪時，郭沫若住在潛回中國前的最後一個住處，地址為：千葉縣市川市東葛飾須和田267番地（現改為千葉縣市川市須和田2丁目）。如今位於市川市真間5丁目3番19號的郭沫若紀念館建築本體，乃將該處舊宅遷移並復原於此而成。因此《臺灣日日新報》中有關郭沫若1936年居於東京的說法，無疑是錯誤的。

48 報紙漢文欄的廢止並非來自殖民政府頒布的行政命令，而是在當局強大壓力下，各報社不得不在表面上配合「主動」廢止。河原功，〈一九三七年の台湾文化・台湾新文学状況——新聞漢文欄廃止と中文創作禁止をめぐる諸問題〉，《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検閲と抵抗の系譜》（日本東京：研文出版，2009.06），頁204-228。

49 曾重刊於《臺灣藝術》1卷2號（1940.04），頁40-49。

動，包括郭沫若在創造社時期的種種經歷，以及後來參與普羅文學運動的概況。⁵⁰

另外，應該是治理中國佔領區之需要，1942年12月出刊的《臺灣警察時報》，種村保三郎的「中等北京語講座」第十五課，課文內容是節錄自郭沫若《創造十年》，描寫福岡自然景觀與人文史蹟的一小段。包括博多灣乃1281年元世祖的大將范文虎征伐日本時，遇到大風而全軍覆沒之地，以及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中，日軍由上海發動攻勢，將閘北化成一片焦土的歷史。⁵¹ 郭沫若的創作被利用以宣揚日本軍威，顯示日本當局的改弦易轍，實肇因於擴張領土的政治野心。

三、郭沫若與台灣人的實際接觸

1930年代郭沫若曾與賴明弘、蔡嵩林在日本會面，並曾投書《臺灣文藝》一事，從張雅惠爬梳相關史料加以研究，柳書琴繼之以深入闡述其意義之後，學界已有清楚的認識。事實上，郭沫若與台灣青年交流的時間早在1920年代即已展開。許俊雅的研究指出，「台灣人在二〇年代與郭沫若已有書信往來，從〈反響之反響·答一位未知的臺灣青年〉和〈《毋忘臺灣》序〉，可以了解郭氏對臺灣（人）的認知及態度。」⁵² 儘管郭沫若這兩篇寫給台灣人的作品，早已為中國學界所知，⁵³ 這段簡短的介紹還是台灣學界首度發表的相關評論。

前述〈答一位未知的台灣青年〉⁵⁴ 是〈反響之反響〉一文所含四節中的第三節，發表於1922年11月刊行的《創造》1卷3期。當時旅居日本福岡的郭沫若，公開回應代稱「S君」的信裡所謂：「遙飛祖國，向文學鍛己一身，欲為個真個的中華人」，表示這些話令他湧起無限的敬意與感慨。但郭沫若也明白

50 有關郭沫若部分見黃得時，〈中國的現代文學〉，《臺灣時報》242號（1940.02），頁136-138。

51 《臺灣警察時報》325號（1942.12），頁1-6。

52 許俊雅，〈《洪水報》、《赤道》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轉載——兼論創造社在日治台灣文壇〉，《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4期，頁208-209。

53 朱雙一，〈1946～1949年新加坡《南僑日報》的台灣書寫〉前言部分，即曾提到郭沫若這兩篇文章。參見《台灣研究》6期（2004.06），頁41及頁51之注釋1。

54 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十六卷》（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10），頁133-135；另收入楊義主編，《台灣愛國文鑒》（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03），頁156-157。

表示，當時的中國只是「塚中枯骨」，不免會讓人大失所望，並對以「真個的中華人」為目標的S君說：「人只怕是沒有覺悟。一有覺悟之後，便向任何方面都好，我們儘管努力，努力做個“真個的人”吧！」⁵⁵

文章最後，郭沫若說寓所不遠的神社要新建迴廊，居住地的海岸上堆了許多從台灣運來的大木，和坐在木堆上觀海的郭沫若親近地對話。藉這些素來沉默無語的大樹之名，郭沫若寫出以下的詩句：

我從前是青蔥蔥地
懷抱在慈母之懷，
如今被人斫伐了，
飄流在這兒海外。

可是我胸中的烈火
是長遠不會消散，
我縱使化石成塵，
我也是着火即燃。

我暫且忍辱負重，
在此替神像建築迴廊，
有一個天火飛來，
我會把神像來一齊火葬！⁵⁶



被砍伐而遠離台灣母土的神木等待有朝一日，以自身引燃焚毀日本神像之火，象徵台灣人終將以自己的力量推翻日本殖民統治。這是對孺慕中國的台灣青年的期許，其思想未受中華民族主義所侷限。

55 郭沫若，〈答一位未知的台灣青年〉，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十六卷》，頁134。原文為簡體字，筆者已改為正體字，以下引文俱同。

56 同註55，頁134-135。

1926年6月，張秀哲（筆名「明心」）、楊志成合著《毋忘台灣》出版，序文由郭沫若執筆。⁵⁷張秀哲本名張月澄，1905年生於台北，為礦業鉅子張聰明的獨子。因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歧視性待遇極為憤慨，認為只有「祖國」中國能解救台灣，遂前往中國求學並展開其革命志業。⁵⁸1925年兩度赴革命的策源地廣東，終於在8月進入嶺南大學就讀，隨後加入國民黨及抗日的行列。⁵⁹張秀哲後來轉學至中山大學，一生中與魯迅有過多次往來。⁶⁰1926年3月，郭沫若至廣州的廣東大學（中山大學前身）任教，及至7月北上參與北伐期間，張秀哲認識了郭沫若。1932年赴日之後，張秀哲跟當時寓居於千葉縣的郭沫若也有過交談。⁶¹

郭沫若在《毋忘台灣》的序文中，談閱讀張秀哲〈一個台灣人告訴中國同胞書〉後，了解到台灣在日本統治之下不是沒有革命，而是因為殖民政府的高壓政策，不敢加以宣傳；台灣人也不是忘了祖國，在廈門和中國人鬥毆的台灣人是日本人收買來的無賴，藉端生事，好勒索賠款。文末郭沫若表示：「我希望他本著大無畏的精神，以後更努力介紹，努力宣傳，以蔚成台灣民眾的徹底的革命」。⁶²在〈答一位未知的台灣青年〉與〈《毋忘台灣》序〉兩文中，郭沫若展現了對於台灣前途的關切，並鼓勵台灣人勇敢革命，以脫離日本殖民地的命運。

1929年到1931年間，正在東京唸中學的王昶雄，經由朋友武井韶平的介紹

57 《毋忘台灣》由廣州的丁卜圖書館於1926年6月出版。根據楊義主編《台灣愛國文鑒》的說法，郭沫若〈《毋忘台灣》序〉本來是張秀哲所著〈一個台灣人告訴中國同胞書〉的序文，後來楊志成作〈看了〈一個台灣人告訴中國同胞書〉〉，並與張秀哲的文章合編成冊，取名《毋忘台灣》，因改郭沫若序文為此書序。見楊義主編，《台灣愛國文鑒》，頁158-159之注釋。

58 張超英，〈張超英談父親〉，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新北市：衛城出版社，2013.02），頁2。

59 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對此有詳細的記載。

60 陳芳明引用魯迅日記與張秀哲回憶錄的記載，對兩人的往來有所論述。陳芳明，〈魯迅在台灣〉，《台灣新文學與魯迅》，頁7-9。附帶一提的是筆者在翻閱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時，發現除了陳芳明所引頁86-87（陳芳明使用1947年8月台北的東方出版社初版本，頁碼為45-46）外，描寫張秀哲與魯迅見面談話之處，還有頁85及頁169-170（初版本的頁44及頁117-118）。

61 張秀哲自述郭沫若除為他的書寫序文外，「我們在廣州及日本的千葉縣也曾談過幾次」，並提及廣州經過清黨時代的前後，「郭沫若先生也去參加北伐」。從文意來看，張秀哲在郭沫若滯留廣東期間已與他結識。筆者由這兩段文字對照郭沫若與張秀哲的生平，推算出兩人認識與往來的時間點。以上兩段分別見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頁72及頁54。

62 郭沫若，〈《毋忘台灣》序〉，楊義主編，《台灣愛國文鑒》，頁158。

認識了郭沫若。⁶³地點是在東京本鄉區，由武井的舅公俵吾吉經營的專售中國書籍的「求文堂」。兩人先後見過三次，郭沫若曾送給王昶雄線裝書《論語鄭氏注殘卷》，並說：「我一向嫌惡儒學和禮教，可是，你們留日台生，最好把四書大致通讀一下。」⁶⁴自稱厭惡儒學和禮教的郭沫若，卻期待負笈日本的台灣學生通讀中國文化經典的《四書》，其間可見郭沫若面對同為漢人文化圈的台灣學生時，有其基於中華民族意識的情感連結。晚年回想起這段奇緣時，對於集文學家、史學家、考古學家、革命家、社會運動家於一身的郭沫若，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時投筆請纓，隻身回到烽火連天的大陸，從事抗日救亡活動，卻在文化大革命時傳出反覆變節的消息，導致郭氏之名成為違反「臨大節而不可奪」之人，於青史留下「寡廉鮮恥」之名，王昶雄不禁發出「這不是一個超傳奇讀書的悲劇是什麼？」⁶⁵的感慨。

1934年，蔡嵩林在《先發部隊》發表〈郭沫若先生的訪問記〉，記載往訪郭沫若時兩人對談的內容，包括郭沫若與郁達夫、成仿吾、田漢等作家的關係，以及郭沫若的文學理念與家人的近況等，郭沫若並以一冊書信集相贈。由於台灣正值提倡「鄉土文學」之際，蔡嵩林也請教了郭沫若的意見，郭回答：「他說的內容不知是怎樣，不過若以你們臺灣那樣的地方，用了固有的世情，用精密強明的表現出來，也未嘗不可的那是很好的目的。」蔡嵩林對以：「不，那不如說它是在意味着鄉土觀念的啟蒙文學的。」郭答以：「即就不大對的，還要充分的可慮呢！」⁶⁶顯示郭沫若與當時的台灣文壇雖有隔閡，基本上支持台灣人書寫具有地方特色的鄉土文學。這篇文章刊出後，張深切在〈評先發部隊〉一文中說：「我們從那篇訪問記略能知道郭先生的最近情況。很有益處。」⁶⁷由此可見台灣文壇對郭沫若動向的關注。

63 學者許俊雅說：「王昶雄也曾敘述在日本書店與郭沫若錯身而過」。筆者搜尋《王昶雄全集》後發現，王、郭兩人的淵源實不僅於此。參見許俊雅，〈《洪水報》、《赤道》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轉載——兼論創造社在日治台灣文壇〉，《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4期，頁208之註腳64。

64 王昶雄，〈一個超傳奇人物的悲劇〉，原載於《民眾日報》，1998.08.12，引自許俊雅主編，《王昶雄全集·第三冊·散文卷二》（台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2.10），頁409。

65 同上註，頁410。

66 蔡嵩林，〈郭沫若先生的訪問記〉，《先發部隊》1號，頁39。

67 楚女（張深切），〈評先發部隊〉，《臺灣文藝》1卷1號（1934.11），頁9。

1935年2月，《臺灣文藝》刊出賴明弘〈郭沫若先生的信〉與〈訪問郭沫若先生〉兩篇文章。前者為1934年11月間兩人書信往來的內容，後者則是1934年12月2日在蔡嵩林帶領下，親自拜訪郭沫若的紀錄。賴明弘在致郭沫若信中洋溢著仰慕之情，連番稱之為「平素我們最敬仰的中國新時代之偉大作家先生」、「素來最為敬仰之先生」，表示希望郭沫若「有所指示臺灣文學之前途」，「使我們同一民族之文學能夠伸展而且能盡夠歷史的底任務」，並告知台灣新文學運動與臺灣文藝聯盟的成立，詢問郭沫若對於台灣新文學路向的意見，就自己反對中國「大眾語文」一事聽取他的看法。⁶⁸ 賴明弘在1930年代台灣話文論戰中主張中國白話文，他不僅藉此再度闡述相關見解，也有爭取中國知名作家支持，以壯大己方聲勢之意。⁶⁹

郭沫若覆信時，首先表達對於台灣文學的善意與興趣，「臺灣有臺灣文藝誕生真是極可慶賀的消息，我是渴望著拜讀。臺灣的自然、風俗、社會、生活……須得有新鮮的觀察來表現出來」，並表示賴明弘關於所謂「大眾語文」的批評是極正確的，還熱情地邀請蔡嵩林與賴明弘前往寓所拜訪。⁷⁰ 正式拜會位於千葉縣市川的郭沫若宅邸前，賴明弘以《臺灣文藝》寄贈，見面時郭沫若說出稍有過眼後的感想：「別無什麼……豈不能更大膽的寫下去？」的期許，也說出「可是臺灣也要受了牽制吧、有着更發展的可能嗎？」顯然對於日本殖民政府壓迫下，發展台灣文學有其困難一事相當理解。至於台灣文學的創作手法與題材方面，郭沫若也直率地說出：「我想還是以寫實主義、把臺灣特有的自然、風俗、以及社會一般和民眾的生活、積極的而大膽地描寫表現出來、臺灣的特殊環境、我們是不能夠知道的、只好廣汎而率直地表現出來，別抱什麼難解的觀念、盡量去努力」⁷¹的建議。

賴明弘這趟日本拜會郭沫若之旅，為他個人的文學生涯與台灣新文學運動

68 賴明弘，〈郭沫若先生的信〉，《臺灣文藝》2卷2號，頁98-100。

69 張雅惠也指出，賴明弘向郭沫若請教大眾語文論爭，將郭沫若的回答置於文章開頭，「似乎欲藉廣受臺灣知識界敬重的郭沫若，回擊臺灣話文一派。」不過，賴明弘所請教的是「中國」的大眾語文論爭，張雅惠誤讀所指為「台灣」的台灣話文論爭。張雅惠，〈賴明弘及其作品研究〉，頁97。

70 賴明弘，〈郭沫若先生的信〉，《臺灣文藝》2卷2號，頁98。

71 賴明弘，〈訪問郭沫若先生〉，《臺灣文藝》2卷2號，頁108、110。

帶來深遠的影響。根據張雅惠的研究，賴明弘以文藝研究的目的前進東京，向東京左翼文壇尋找指導者，目睹郭沫若兒女說著流利的日語，從而找到「為階級盡忠就是為漢民族盡忠」的答案，日後其思考完全跳脫民族和語言的矛盾，選擇以日文創作即是源自於此時的體認。⁷²學者柳書琴對此則有更進一步的研究，除了指出賴明弘拜訪過郭沫若後，《臺灣文藝》陣營對文藝運動的態度轉為積極，與東京文壇的中國左翼作家交流頻繁，並認為郭沫若接待來自台灣的賴明弘等人，鼓勵台灣作家廣泛聯絡新舊文學者，更積極大膽展開文學活動之外，投稿《臺灣文藝》的〈魯迅傳中的誤謬〉，引發增田涉在《臺灣文藝》發表回應文章〈關於「魯迅傳」的說明〉（〈「魯迅傳」について言分〉），⁷³更是促成了台灣文壇與日本的中國研究學者增田涉間的直接交流。⁷⁴

四、戰後初期的兩極化評論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五四以降的中國現代文學幾乎同步進入海峽兩岸讀者的視域，郭沫若文學的介紹也由於左翼思潮的流行而重新展開。例如嘉義蘭記書局的進貨單中，即可明確見到郭沫若文學的紀錄。⁷⁵雜誌方面，1945年12月，《政經報》刊載了漢詩〈歸國雜吟〉之二的〈同心同德一戎衣〉，描寫蘆溝橋事件爆發不久，郭沫若拋別日本的妻兒，回國參與抗日戰爭的決心。1946年8月，《台灣評論》刊登了呼籲以民主和平方式，制止滿日瘡痍的中國陷入內亂的〈反內亂〉。1946年12月，《台灣學生》在〈中國作家傳記〉中介紹了郭沫若北伐以後轉變為左翼派，領導普羅文學，後來加入共產軍，為國民

72 張雅惠，〈賴明弘及其作品研究〉，頁97、139。

73 載於《臺灣文藝》2卷3號（1935.03），頁43-44。附帶一提的是柳書琴〈臺灣文學的邊緣戰鬥：跨域左翼文學運動中的旅日作家〉中，將〈「魯迅傳」について言分〉譯為〈關於「魯迅傳」之辯解〉（《臺灣文學研究集刊》3期，頁76），筆者依許俊雅〈《洪水報》、《赤道》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轉載——兼論創造社在日治台灣文壇〉（《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4期，頁212），譯為〈關於「魯迅傳」的說明〉。

74 柳書琴，〈臺灣文學的邊緣戰鬥：跨域左翼文學運動中的旅日作家〉，《臺灣文學研究集刊》3期，頁74-76。

75 柯喬文，〈蘭記代理有關中國與台灣文學書籍的分析〉，《文訊》256期（2007.02），頁73。

政府發布通緝令等經歷，並在1947年7月轉載其詩作〈海濱的眺望〉。⁷⁶

報紙方面，1946年1月23日，黃榮燦主編的《人民導報》「南虹」副刊陸續轉載了〈蘇聯紀行——參觀斯大林紡織工廠〉與〈向人民大眾學習〉。前者節錄自《蘇聯紀行》，乃1945年7月14日實地參訪蘇聯工廠的日記；後者則是呼籲文藝工作者不要妄自尊大，應從人民大眾的生活中學習，這兩篇都是社會主義思想的發揮。6月至9月間，龍瑛宗主編的《中華日報》日文欄，則是陸續刊載了寫於1924年的〈小品六章〉中的〈白髮〉、〈墓〉和〈路畔的薔薇〉（日文題為〈路傍の薔薇〉）。⁷⁷ 1946年7月26日，楊達主編的《和平日報》「新文學」欄12期，以〈慈悲外一章〉為題的詩選，轉載了同月15日才刊登於上海《文匯報》的郭沫若〈斷想四章〉中的最後兩章，分別是批判美國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慈悲〉，因對中國人民的苦痛置若罔聞而自我詛咒的〈詛咒〉，傳達楊達對依賴美國的國民黨政權之不滿，以及對於被壓迫人民的關懷之意。從楊達接收郭沫若文學之快速，不難想見台灣文化界急於建立傳遞兩岸文學訊息的管道，並藉由知名作家的創作對國民黨政權進行政治批判。

戰後台灣由於政權的遞嬗，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交會於此，走過皇民化運動時期的日文時代，文學場域再次呈現百花齊放的多元化風貌。轉載的郭沫若文學來自不同時期、不同風格的創作，刊載的語言也呈現多音交響的情況，有以中文原文呈現，也有翻譯為日文者，方便使用不同語言的讀者。尤其《教科書式華語自修書》收錄郭沫若參加北伐的從軍紀實〈北伐途次〉，⁷⁸ 考量到日語世代學習中國語（北京話）之需要，書中附有詳盡的日文注釋及翻譯。在中國接收與擺脫日本殖民統治之後，由於台灣民眾亟需認識中國，左翼思潮的瞬間復甦，以及戰爭結束後普遍渴望和平的心態下，戰後初期郭沫若及其作品的

76 各篇刊載詳情為：郭沫若，〈同心同德一戎衣〉，《政經報》1卷5期（1945.12），頁19；郭沫若，〈反內亂〉，《台灣評論》1卷2期（1946.08），頁4；〈中國作家傳記——郭沫若〉，《台灣學生》1輯（1946.12），頁64；郭沫若，〈海濱的眺望〉，《台灣學生》1卷3期（1947.07），頁99-100。

77 郭沫若，〈蘇聯紀行——參觀斯大林紡織工廠〉，《人民導報·南虹》21期（1946.01.23）；郭沫若，〈向人民大眾學習〉，《人民導報·南虹》24期（1946.01.26）；郭沫若作，鄧石榕譯，〈白髮〉，《中華日報·文藝》，1946.06.27；郭沫若作，夢生譯，〈墓〉，《中華日報·文化》，1946.08.22；郭沫若作，陳金火譯，〈路傍的薔薇〉，《中華日報·文化》，1946.09.28。

78 香坂順一，《教科書式華語自修書·卷四》（台北：三省堂，1946.06），頁106-119。

介紹，除了早期的新詩與隨筆散文之外，著重參與北伐、抗戰等與中國近代重要事件，或反對內亂等與國家未來發展有關的書寫，以及對抗蔣介石政權等表現左翼的政治傾向與社會主義思想的發抒。

另外，1945年9月16日吳新榮的日記中有：「今日於病床讀了胡適的《嘗試集》，因為新式的作法，致使不能大了解，也不如讀郭沫若詩集之時的感激」，⁷⁹自然流露出閱讀郭沫若詩集所帶來的感動。1946年8月16日，龍瑛宗在《中華日報》發表〈中國文學的動向〉（〈中國文學の動向〉），提及5月時上海紀念高爾基逝世十周年的演講會上，郭沫若站台時所強調，高爾基的精神在於「為民眾的藝術」的意義，並表示：「以浪漫主義者出發的郭沫若，現在對中國文壇也扮演著很重要的角色」，⁸⁰顯示對於郭沫若左翼立場的認識，並對其文學地位有正面的評價。1946年9月，杜容之〈抗戰期中我國文學〉裡的「國防文學的黃金時代」指出，郭沫若「參加政府的政治宣傳機構，從事抗戰工作」，並肯定郭沫若的〈八百壯士頌〉是當時的傑出詩篇。⁸¹1947年1月，蘇新在《臺灣文化》上發表〈也漫談臺灣藝文壇〉，透露當時台灣的文化人對大陸「有價值的文人」都很尊敬，很想讀他們的著作，郭沫若也列名其中。⁸²同年2月，劉捷在〈關於報告文學〉中推崇「郭沫若的『北伐』」，亦算是一篇歷史記錄，它的本質，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報告文學」。⁸³

1947年8月15日，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兩週年之際，二二八事件當局恐怖的清鄉行動之後，為使大陸人士對台灣人有新的認識和評價，眾志一心建設新台

79 吳新榮作，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06），頁193-194。

80 龍瑛宗，〈中國文學的動向〉，原以日文載於《中華日報》，1946.08.16，引自龍瑛宗作，陳千武、林至潔、葉笛譯，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五冊評論集》（台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1），頁264-265。

81 杜容之，〈抗戰期中我國文學〉，《臺灣文化》1卷1期（1946.09），頁6-7。

82 蘇新說：「事實上本地文化人，尤其是文人，對於國內有價值的文物都很重視，對於國內有價值的文人都很尊敬，我們尊敬胡適，魯迅，林語堂，郭沫若，田漢，矛盾，陶知行，聞一多等，而且很欲讀他們的著作。」引自甦姓（蘇新），〈也漫談臺灣藝文壇〉，《臺灣文化》2卷1期（1947.01），頁14。

83 劉捷，〈關於報告文學〉，《臺灣文化》2卷2期（1947.02），頁15。

灣，張秀哲以《「勿忘台灣」落花夢》，⁸⁴公開發表親身參與抗日運動的革命史實，追懷並證明為數不少的台灣人，在日治時期參與了民族解放運動。⁸⁵提及當年出版《毋忘台灣》⁸⁶時，張秀哲說這部小冊子有「創造社的革命文人郭沫若先生」為其寫序，並記載自己對郭沫若的印象如下：

郭沫若先生是國內一位最特色的革命詩人，同時也是一位實踐的革命政治家，我們在廣州及日本的千葉縣也曾談過幾次。他為了革命工作，歷來對其個人的家庭生活常是不予過問，非常簡單，當他隨從國軍出發北伐的時候，他對家裡夫人子女的米糧也沒有為他們充分的準備而託他的友人代為設法，到了革命軍克服武漢的時代，他雖身居權要但對金錢物質纖毫不染，身無一物甘願孤身亡命日本十數年，到底是做個窮困的文人，抗戰的時代後來又在日本拋棄妻子秘密脫出日本又再跑到重慶去參加抗戰，實在可令人十分敬仰的。⁸⁷

在參與革命事業的張秀哲筆下，郭沫若是令人敬仰的革命典範，為了大我的理想奮鬥而不惜拋家棄子，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氣概。

1947年9月，台灣詩人楊雲萍在〈近事雜記〉中，提及郭沫若一篇比較魯

84 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台北：東方出版社，1947.08），2013年2月由長子張超英的妻子張顏千鶴授權新北市的衛城出版再版，並由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再版書除附有張顏千鶴〈寫在出版前〉說明再版之經過外，並新增張超英生前寫於2004年的文字〈張超英談父親〉、張炎憲〈張秀哲書寫本書的心境〉、李筱峰〈迷惘的歷史彌足珍貴——張月澄（張秀哲）《勿忘臺灣落花夢》再版序〉、曹長青〈「祖國」是一場惡夢——張秀哲《「勿忘臺灣」落花夢》再版序〉4篇序文，以及張秀哲的傳略與照片、〈張秀哲年表〉等參考資料。根據〈張超英談父親〉一文的說法，張秀哲1945年10月從上海返台之後，避居北投動筆寫這本書，書稿在1947年5月完成，8月出版後因故收回湮滅（衛城出版《「勿忘台灣」落花夢》，頁6）。筆者從東吳大學圖書館借得1947年初版本，對照之後，發現再版時盡量保留張秀哲原用語，並已修訂明顯是錯字或標點符號有誤之處，加以初版流通不廣，目前國內圖書館僅國家圖書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與東吳大學圖書館有所收藏，為方便讀者查考，本論文引文與註腳說明皆採用衛城出版的再版本。

85 張秀哲之用心，可從〈緒言〉清楚讀出。見《「勿忘台灣」落花夢》，頁33-36。

86 東方出版社初版的《「勿忘台灣」落花夢》中，書名作「勿忘臺灣」，刊行時間為「民國十三年正月」（頁32）。由於張秀哲1925年（民國十四年）才從香港轉赴廣東，爾後才有《毋忘台灣》一書之出版，因此出版時間應是誤記。衛城出版的再版本將「民國十三年」更改為「民國十六年」，書名仍作「勿忘臺灣」。見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頁72。

87 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頁72-73。

迅與王國維的文章，⁸⁸另敘述自己閱讀郭沫若作品的感想如下：

偶閱郭沫若先生的「歸去來」（北新書局刊）。嘗以為郭氏的詩比他的小說好，他的自傳性的文章，比他的詩好，他的學術論著，比他的自傳性的文章更好。這本「歸去來」所收的文字，是屬於自傳性的文章的。裏面，「回到上海」一篇，有敘述一隻「很大的暗灰色的蛾」，直象徵著當時的淒愴的空氣。

記得太平洋戰爭期間，我有時拏着他的「卜辭通纂」，或是「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和「圖錄」，在防空洞裡讀；這些大著，每使我忘掉戰爭的悲慘和恐怖。轟炸的飛機已去了。我把「通纂」或是「考釋」放下，舉首從洞裡看不看地看洞外上面，上面的前邊，楊桃的果實，正累累地飄搖在晚風中。⁸⁹

這段文字說明楊雲萍對郭沫若多重身分的認識，戰爭期在閱讀郭沫若著作中等候光明到來的心境，以及台灣知識菁英對郭沫若的正面評價。

由於兩岸互動的活絡，此時報刊上不時可見跟郭沫若有關的記事或報導。例如1946年6月13日的《和平日報》「新世紀」副刊，以〈郭沫若談教育〉⁹⁰為題，摘要介紹了5月21日郭沫若在上海演講「今後教育應走的途徑」的重要內容。1946年9月起《臺灣文化》的「文化動態」，有郭沫若正在著手撰寫長篇小說，史劇《屈原》將被改編為大型歌劇，《蘇聯紀行》受讀者熱烈歡迎而再版中，陸續發表於《文匯報》的《南京印象》已正式刊行，以及其他舊作經整理後重新出版等藝文消息。⁹¹1946年10月間，《民報》不只一次地報導了郭

88 郭沫若這篇作品是〈魯迅與王國維〉，初次發表於《文藝復興》（上海）2卷3期（1946.10），楊雲萍誤記為《文藝叢刊》2輯。楊雲萍說：「郭沫若氏曾比較評論魯迅先生與王國維先生時，注意及二位先生的友朋，而說魯迅先生的朋友，大部份皆進步的良心的份子，魯迅先生有受此友朋的影響云云。（參看《文藝叢刊》第二輯，郭氏文）」。楊雲萍，〈近事雜記（四）〉，《臺灣文化》2卷3期（1947.03），頁18。

89 楊雲萍，〈近事雜記（七）〉，《臺灣文化》2卷6期（1947.09），頁10。

90 《和平日報·新世紀》16期（1946.6.13）。承蒙友人陳建忠提供報紙影本，特此致謝。

91 《臺灣文化》1卷1期（1946.09），頁28；《臺灣文化》1卷3期（1946.12），頁31；《臺灣文化》2卷1期（1947.01），頁30-31。

沫若以「社會賢達」的身份，赴北京參與國共兩黨的和平談判；⁹² 1947年1月26日，還以〈別婦拋雛的郭沫若氏／夫人將來台〉為題，報導了郭沫若日籍夫人安娜來台尋找兒子的事蹟，可見台灣作家不只熟稔郭沫若的名號，對其近況也有所注意。

1948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爆發週年紀念當天，郭沫若在香港《華商報》發表〈還要警惕著不流血的「二二八」〉。⁹³ 文中不僅批判蔣介石政權屠殺人民的殘酷，也表示擔心人們口中「援華」的美國帝國主義，處心積慮要將台灣弄成菲律賓第二的侵略手段。共產黨員郭沫若對國民黨的批評，無疑帶有爭取中國人民認同共產黨的政治動機。此後，批判郭沫若的負面文章紛紛出籠。1949年3月1日出版的《中國近代人物逸話》中「郭沫若的棄婦」一節，就郭沫若日籍妻子來台，將飛往香港尋夫，針對郭沫若拋棄前兩任妻子一事加以嘲諷，連帶指責魯迅、田漢等「前進作家」，「私生活亦染『黃色』」，「何嘗敦品勵行哉！」。⁹⁴ 3月4日，署名為「音」者，在《公論報》發表〈郭沫若與沈從文〉，轉引上海報載郭沫若在北平發表的文章，「抨擊非共產作家的作品無裨於人民，尤其指斥在北京大學做教授的沈從文，說他專寫戀愛小說。並且說共產作家擁護人民革命運動，其他的作家則不然。」文中並追溯郭沫若與沈從文的文壇恩怨，嚴詞批判「前進」作家所謂「不革命」就是「反革命」的說法。⁹⁵

1949年12月，《新希望》週刊以「鐵幕報導」為題，刊出〈「北投」文人剪影〉。在「聾子郭沫若」這一小節中，作者先回憶在重慶的演講會上初見郭沫若的印象，接著譏諷郭沫若養了嘍囉們，仍舊未能登上文壇盟主的寶座；從《女神》起家之後「不知長進」，經過二三十年，寫的詩還是那個調調兒；寫

92 〈在滬各方代表／定廿一日晉京〉，《民報》，1946.10.21，2版；〈和平商談重新揭幕／各代表聯袂赴京／民治黨司徒氏發表時局觀感〉，《民報》，1946.10.22，2版。

93 曾健民研編，《新二二八史像——最新出土事件小說·詩·報導·評論》（台北：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03），頁354-355。

94 黃公偉編，《中國近代人物逸話》（台北：全民日報社，1949.03），頁66。

95 音，〈郭沫若與沈從文〉，《公論報·日月潭》319期（1949.03.04）。

了些劇本，總沒有看過一個完美的，恐怕是「江郎才盡」了。⁹⁶從文字的敘述語氣來看，前述3篇的執筆者應該是大陸來台人士；再從稱呼郭沫若為「前進作家」或「『北投』文人」，可推知作者來自與郭沫若敵對的國民黨陣營，顯示國共內戰炮火猛烈之際，政治派系之爭已蔓延成為文學界的黨同伐異。

五、解嚴前後從封鎖到開放

1949年10月1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12月國民政府撤退遷來台北，蔣介石在台灣延續國民黨政權。兩岸長期隔絕的狀態下，郭沫若發表過與台灣相關的詩歌與劇作。1958年9月12日發表在《人民日報》的〈把上甘嶺搬到台灣去！〉，⁹⁷歌頌韓戰期間與美軍作戰後，從上甘嶺撤回中國的志願軍，並譏諷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的美國是狂人，存心充當蔣介石的殉葬豬，想把金門馬祖作為自己的墳墓。1960年6月25日創作的〈一定要解放台灣〉中，郭沫若公開歌頌社會主義有無比的優越性，表示美國帝國主義已到了末日，呼籲「台灣同胞們」團結起來，並宣稱「一定要解放台灣，讓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⁹⁸寫於1962年1月18日的〈鄭成功光復台灣三百周年紀念〉，一開始即謂：「台灣自古屬中華，漢族高山是一家」。⁹⁹1963年郭沫若發表劇作《鄭成功》，¹⁰⁰取材自鄭成功從荷蘭手中取得台灣的歷史。相較於日治時期和台灣相關的作品，明顯可見中華民族主義洋溢在字裡行間。

從1949到1987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中國左翼文學在台灣遭到查禁的命

96 何家，〈「北投」文人剪影〉，《新希望》週刊41期（1949.12.03），頁7。

97 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三卷》（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10），頁340-341。

98 郭沫若，〈一定要解放台灣〉，原載於《人民日報》，1960.06.27，收於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四卷》（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08），頁406-408。

99 郭沫若，〈鄭成功光復台灣三百周年紀念〉，原與〈詠椰子樹〉聯合題為〈詩二首〉，發表於《南方日報》，1962.02.01，引自《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四卷》，頁164。

100 最初發表於北京《電影創作》2、3期，1979年9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收入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八卷》（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01），頁277-521。

運。¹⁰¹ 民間出版品必須自我克制，先行篩選並刪減不妥的內容。1976年起大漢出版社陸續出版的《中國新文藝大系》，無疑是介紹中國新文學運動最重要的巨著。這套書由1935至1936年間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¹⁰² 改題而來，原是新文學運動以來最有系統、最巨大的現代文學史料大結集，呈現1917至1927年間第一個10年的文壇全貌。大漢版刪除了《戲劇集》、《史料·索引》二書，以及許多導言與重要作家的作品，¹⁰³ 包括與郭沫若相關的部份，以避免觸犯政治禁忌。

在肅殺的恐怖統治之下，左翼文學史料無法在坊間流通，學術性的論述極為少見。從台灣赴國外研究求學，趁機蒐集中國新詩史資料的詩人高準，1980年間發表〈中國新詩人出生年表〉，總計列出包含郭沫若在內的235位詩人的生卒年。¹⁰⁴ 針對在台灣從事新詩歷史的研究有其困難，高準說出：「首先，就作品的蒐集而言，凡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作品，除了胡適、徐志摩等少數人外，絕大部分幾乎均遭禁止而難於獲見」，以及「第二項困難則是對於作者生平的瞭解，比作品的獲得就還要不容易」¹⁰⁵ 的親身體會。

在資料蒐集不易的情形下，翌年高準繼續發表相關研究成果〈中國新詩代表作選析〉。第一部分先選錄6位重要作家的作品，以「郭開貞」本名刊出並評介〈太陽禮讚〉一詩，「題解」中說：

這首詩作於一九二〇年，是詩集〔女神〕中一首。全詩以激動的感情與奔放的語句寫出對於象徵著光明與新生的朝陽的讚頌，氣勢雄壯。這種噴薄的激情，以自由的句法與鮮明的形象直抒胸臆而出，在當時可謂風

101 有關遷台後的國民黨政府為加強思想文化的控制，以防止共產主義的入侵，陸續頒布查禁新聞雜誌圖書的相關法令，包括郭沫若著作在內被查禁的書目類別，以及書刊查禁對台灣的文藝活動造成的影響等，請參考蔡盛琦，〈1950年代圖書查禁之研究〉，《國史館館刊》26期（2010.12），頁75-130。

102 《中國新文學大系》10冊包含胡適編選《建設理論集》、鄭振鐸編選《文學論爭集》、茅盾編選《小說一集》、魯迅編選《小說二集》、鄭伯奇編選《小說三集》、周作人編選《散文一集》、郁達夫編選《散文二集》、朱自清編選《詩集》、洪深編選《戲劇集》、阿英編選《史料·索引》。

103 參見〈重印說明〉，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台北：業強出版社，1990.03）書前。解嚴後的1990年，業強出版社重印《中國新文學大系》時，復原了遭大漢版刪除的部份。

104 高準，〈中國新詩人出生年表〉，《書評書目》87期（1980.07），頁115-118。

105 同註104，頁108、109。

格全新，所以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但郭氏的詩，有文學價值與歷史地位的主要只是這第一本詩集〔女神〕，其他詩作則在其寫詩的第一個十年（一九一九——一九二八）者，大部尚能保持水準，但並未更有進展；而其後所作就江河日下，甚至成為押韻的教條口號而已。¹⁰⁶

以「中國新詩代表作」介紹〈太陽禮讚〉，簡要地談其風格與影響，對郭沫若《女神》之後的詩作整體評價不高，大致來說內容中肯。郭沫若的行事風範方面，則不乏貶意。詩前的「作者傳略」中評論如下：

他於五十年代初，因寫詩諂諛史大林而頗為人所不齒；至「文革」時期又獻詩諂諛江青，並自稱「用今天的標準看來，我以往所寫的幾百萬字，全部都應該燒掉」，達到了自我作賤的極點，遂被譏為「文丑」之典型。¹⁰⁷

即使對郭沫若進行了相當程度的批判，刊出郭沫若〈太陽禮讚〉的《縱橫月刊》才創刊，就立即遭到查禁的下場，後續內容連載的計畫也因而觸礁。¹⁰⁸

相對於學術研究與民間出版品的處處受限，由執政當局主導或支持的論著，成為極少數得以在出版市場公開流通的主力，批判性的立場也左右了認識郭沫若的視角。1975年出版的《中華民國文藝史》，無疑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出版品。相較於同時期的其他書籍，這部由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策劃，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辦，尹雪曼掛名總編纂的文學史書，對郭沫若有較多的著墨之處。¹⁰⁹ 在認識郭沫若及其文學方面，應當起過相當程度的作

106 高準，〈中國新詩代表作選析（一）〉，《縱橫月刊》創刊號（1981.02），頁93。

107 同註106，頁92。

108 從本篇前所列綱目來看，這篇文章預計介紹18位詩人。有關被查禁一事見高準，〈一段艱困的途程〉，《中國大陸新詩評析（一九一六——一九七九）》（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09），頁21。

109 包含生平傳略、創造社時期的文學活動、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調、國防文學的主張、抗戰後期左派的文學評論，以及詩歌、散文、劇本創作等，甚至因政治因素被封鎖而極難獲知的，郭沫若在中共政權下領導文藝活動的概況等。

用。由於這是戒嚴時期國民黨官方首度介紹滯留大陸的作家，¹¹⁰ 所論當然不脫一向敵視共產黨文人的立場。然而該書特別收錄了郭沫若〈在轟炸中來去〉裡，有關「晉謁」蔣委員長（蔣介石）的一節，並有「對 蔣委員長的『有威可畏』、『和藹可親』的描寫，十分生動」¹¹¹ 的評語，明顯藉此歌頌當時的台灣領導人蔣介石。就在這種既批判又利用的兩手策略下，戒嚴時期的台灣讀者反得以一睹郭沫若的作品。

1988年，金達凱《郭沫若總論——三十至八十年代中共文化活動的縮影》由台北的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這是戰後台灣唯一出版的郭沫若專論。作者自陳撰寫這本書的原因之一，在於「郭沫若的一生，正是中共整個文化統戰活動的縮影。揭露了郭沫若的臉譜，也就等於揭穿共黨控制大陸文壇，將文學藝術作為政治鬥爭工具的底牌」。¹¹² 由於金達凱和國民黨的深厚淵源，¹¹³ 負面評價郭沫若的背後，除了郭沫若備受質疑的人格問題外，也可能與作者、傳主分屬敵對的政治陣營有關。

值得注意的是一片撻伐聲中，台灣文壇享有盛名的詩人余光中，曾在《掌上海雨》收錄的〈從古典詩到現代詩〉一文裡，坦言自己最早接觸到的新詩是郭沫若的《鳳凰》與臧克家的《烙印》，並說這兩本詩集都不能算是傑作，但對於年輕的他頗發生一點影響。¹¹⁴ 這段回憶透露出大陸遷台作家成長於原鄉時，或許多多少少閱讀過郭沫若的創作。由此可見，即使當局有意杜絕左翼文人的作品在台傳播，台灣絕大部分的作家迫於政治壓力，也不再公開提起，然而閱讀郭沫若創作的經驗，卻極有可能在潛移默化間，涵養了台灣不同族群作

110 編輯部，〈尹雪曼小傳及作品目錄〉，《文訊》270期（2008.04），頁37。

111 尹雪曼總編纂，《中華民國文藝史》（台北：正中書局，1975.06），頁326。

112 金達凱，〈自序〉，《郭沫若總論——三十至八十年代中共文化活動的縮影》（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09），頁1-2。

113 金達凱（1925-），安徽人，筆名司徒敏、金聲。1950年10月來台，曾任教於政治作戰學校，顯然具有中國國民黨黨員的身分。有關金達凱之個人資料，可參考台灣文學網之簡要介紹，國立台灣文學館，（來源：http://tl.n.mtl.gov.tw/ch/m2/nmtl_w1_m2_c_2.aspx?person_number=H26010）。

114 余光中，《掌上海雨》（台北：大林書店，1973.10），頁179。附帶說明的是學者黃曼君比對郭沫若〈鳳凰涅槃〉與余光中〈鳳凰〉，發現兩者在意象與主題內涵，以及藝術表現和創作方法上，其實有很大的不同。由此看來，郭沫若應該是啟發了余光中詩歌創作的題材，而非藝術手法的表現。黃曼君，〈余光中現代詩學品格論〉，《藍星詩學》10期（2001.06），頁162-164。

家的書寫能力。

1980年代的戒嚴末期，在本土化與民主化的雙重浪潮下，威權體制逐漸鬆動。1987年7月15日起解除戒嚴，對文學傳播發生了重大影響，郭沫若及其作品從此不再成為禁忌。1989年2月，楊牧與鄭樹森合作編選《現代中國詩選》兩冊，收錄1917年至1987年間發表的中文現代詩作，由台北的洪範書店有限公司出版。書前介紹明確指出本書「從浩瀚的資料中，歸納出一條明顯的文學傳統，前後涵蓋七十年，選詩人近百家，近一世紀來海峽兩岸和香港海外的作品，擇其具有藝術代表性者錄入」。郭沫若的〈太陽禮讚〉與〈天上的市街〉不僅入選，書後「詩集選目」還列有包括《女神》、《星空》在內的十本郭沫若詩集。雖然全書僅有一篇簡介中文現代詩史的〈導言〉，對入選作家與詩作沒有任何評論或賞析，不過分屬台灣與香港的兩位知名學者兼作家，對全球華人詩作的全面性整理，篩選出來的無疑是中文現代詩的經典，確立了這些作者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1989年11月，廣西教育出版社授權發行的「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叢書，以在中國大陸「全國第一屆優秀教育圖書評選中榮獲一等獎」為號召，由台北的海風出版社發行正體字版。《郭沫若》一書列為第9冊，收錄詩歌、散文、戲劇、小說各類重要創作與解說，還附有〈郭沫若的生平和創作〉介紹文與〈郭沫若年表〉，成為了解郭沫若及其文學的重要憑藉。台灣學者蔡源煌在為該書撰寫的序文中說，這篇序文之所以題為〈重探三〇年代文學的神話〉，「其實是帶有前瞻性的期待，旨在為開放的禁地呈現較為超然的評估」，¹¹⁵正好說明了這套叢書在台出版的歷史意義，在於為193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的重新引介奠定里程碑，正式宣告從嚴格禁制到全面開放新時代的來臨。整體而言，除蔡源煌的序文之外，該書內容完全複製中國學者的詮釋觀點。¹¹⁶ 例如〈郭沫若的生平和創作〉一開始有這樣的介紹：

115 蔡源煌，〈重探三〇年代文學的神話〉，黃曼君選評編輯，《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郭沫若》（台北：海風出版社，1989.11），頁14。

116 1994年3月上梓的二版書中，目錄雖有蔡源煌的序文〈重探三〇年代文學的神話〉，事實上連同姚雪垠〈大陸原版序〉，兩篇文章都已被唐強〈新版序言〉所取代，自此該書已不復有台灣觀點的存在。

當舊中國從昏睡中震醒，五四運動的浪潮洗刷山河的時候，一個旅居日本的青年詩人強烈感受到「五四」時代的脈搏，而吹響了向舊世界進軍、追求中華民族解放和新生的嘹亮號角；這位詩人，就是中國新詩的開拓者和奠基人郭沫若。郭沫若在學術文化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僅從文學上看，詩歌、戲劇、散文、小說、文學理論和批評等許多領域，都有獨特而卓著的成就，其中，又以詩歌的成就最為突出。¹¹⁷

全面讚揚郭沫若的這段文字，清楚可見和台灣的出版品有顯著的差異，顯示解嚴所帶來政治氛圍的日趨開放，使得文學傳播的來源與管道，甚至於詮釋觀點都益趨多元。

六、結語

日治時期以來，郭沫若與台灣文壇確實頗有淵源，並對台灣文學的發展造成了一些影響。不僅郭沫若的詩、小說、散文、劇作、自傳與翻譯等各類型作品，曾經進入台灣作家的閱讀經驗，新詩創作更是台灣作家學習的典範。日治時期楊華詩作明顯有對郭沫若作品的模仿，戒嚴時期余光中也不諱言受到郭沫若詩集的影響。這些在在證明郭沫若文學不僅在日治時期，成為台灣本地作家創作的資本；戰後從大陸移入台灣的外省族群，也曾經吸收來自郭沫若文學的養分，台灣文學的面向因此而更豐富與多元。

仔細考察台灣文化人對郭沫若文學的接受，不同時期之間仍有些本質上的差異。1920年代主要刊載郭沫若早年留學日本時期浪漫主義的創作，其中〈勝利的死〉與〈牧羊哀話〉反對帝國主義與殖民統治的內在精神，清楚映照出台灣人追求自由解放的心情。隨著郭沫若思想的轉向左翼，並傾注心力於學術研究，加以社會主義思潮在台灣逐漸流行，1930年代台灣民間報刊轉載的郭沫若作品，不只有一般性的文學創作，也包括蘊含馬克斯主義思想的小說〈馬克斯進文廟〉，和屈原研究等學術成果，展現出多樣化的不同風貌。至於台灣人接

117 黃曼君選評編輯，《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郭沫若》，頁5。

觸的郭沫若作品，有從中國直接輸入者，亦有透過日本文壇之仲介，其間可見台灣、中國、日本三個文學場域的相互作用與影響。

再者，由於郭沫若擁有中國五四文學大家的身分，台灣作家對他的重視程度也就不難想像。1920年代起，郭沫若不僅和台灣學生書信往返，也陸續和多位台灣作家面對面地接觸。尤其賴明弘專程前往拜訪亡命日本的郭沫若，將其視為「偉大」的作家加以敬重，並就台灣文學的發展與鄉土文學的路向聽取郭沫若的意見，揭露1930年代台灣話文論戰開展以來，賴和、楊逵等重量級作家明確表態支持並嘗試台灣話文書寫之後，¹¹⁸ 北京話文派欲借重中國知名作家的發言以支持自己的立場，以及台灣新文學運動取鏡中國的發展歷程。從台灣作家紛紛投入建設台灣的鄉土文學，以及賴明弘並非單方面地接受郭沫若的指導，而是有自主意識地擇取中國的某種經驗，希望能轉化為台灣文壇所用這兩件事來看，台灣新文學運動係獨立於中國而存在，台灣作家與郭沫若互動時的主體性，由此不言自明。

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曾經留學日本，不僅透過日文翻譯接受世界文學的洗禮，文學活動也在日本展開，後來逃避政治迫害時亦選擇流亡日本。日本文壇不僅提供台灣作家與郭沫若實際接觸、對話交流的舞台，也仲介了郭沫若文學給台灣作家，例如賴明弘與龍瑛宗就曾經在《改造》讀過郭沫若的作品。另外，1933年至1937年間，《改造》先後刊出過郭沫若的四篇文章，包括批判蔣介石的〈現代支那政治家論〉，參與北伐見聞錄的〈武昌城下〉，〈脫出記〉的日文翻譯〈日本を去る〉，以及摘自〈在轟炸中來去〉拜訪蔣介石的紀錄〈蔣介石を訪ふ〉。¹¹⁹ 郭沫若撰寫的〈國防・汚池・煉獄〉也曾經譯為

118 賴和在193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爭（或稱為台灣話文論戰）中，站在支持台灣話文的立場，小說創作也因而從北京話文轉而傾向台灣話文。從論戰中的相關文章可知，當時的楊逵也曾投稿贊成台灣話文書寫，然參與論戰的文章未被刊出。楊逵身後遺留的數篇手稿與晚年的回憶錄，可具體證明楊逵在以日文創作成名之前，確實曾經嘗試台灣話文寫作，後因效果不佳而放棄。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3.08），頁253-254；筆者，《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逵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9.07），頁46-51。

119 四篇刊載情形依序為：〈現代支那政治家論〉，《改造》15卷10號（1933.10），頁68-76；〈武昌城下〉，《改造》17卷5號（1935.05），頁89-112；〈日本を去る〉，《改造》19卷13號「上海戰勝記念臨時增刊號」（1937.11），頁296-304；〈蔣介石を訪ふ〉，《改造》19卷15號（1937.12），頁56-59。

日文，以〈「國防文學」について〉為題，1936年刊載於東京的左翼雜誌《文學案內》。¹²⁰由於《文學案內》與《改造》都是台灣作家熟悉的日文雜誌，《文學案內》和楊逵創辦的《臺灣新文學》雜誌間還有密切的合作關係，¹²¹郭沫若這些作品極有可能進入台灣知識菁英的眼界，影響了台灣作家的文學理念和對於中國政治圈的理解。

二次大戰結束後政權更迭之下，日本殖民政府退場，大陸出版品得以順利進入台灣。在台灣、日本、中國三方文化的交會之下，介紹郭沫若及其作品的文字，不僅有中國語和日本語之不同，甚至為台灣人學習中國語設想，以中、日文對照版付印，與戰爭期日本為統治中國佔領區需要，北京語講座以中、日文對照方式介紹郭沫若及其作品遙相呼應。左翼思潮的再次風行，連帶使得郭沫若各個不同時期的各類型創作，紛紛呈現在台灣人面前。但也因為國共兩黨的政治鬥爭，繼日治時期官方色彩的《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欄對郭沫若的嘲諷之後，台灣的報紙刊登了不少大陸來台人士批評郭沫若的文章，和台灣作家的讚美肯定有截然不同的面向。

戒嚴時期在國共兩黨對峙的歷史仇恨下，台灣可見評論郭沫若的論述，絕大多數擁有執政當局的支持或背書，其內容幾乎是毫無例外的批判。對郭沫若的攻擊不僅包含文學創作、論述與政治信仰，還從私領域的感情生活及與文友間的個人恩怨，轉移至學術品質與抄襲等違反學術倫理的質疑。除了前述《中華民國文藝史》等書之外，最廣為人知的莫過於余英時指摘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抄襲錢穆的《先秦諸子繫年》，繼而引起中國內部對郭沫若功過的重新檢討，相關論點也深深影響了台灣學界。但余英時也因此遭到部分學者懷疑是出自政治動機，至今擁余與反余的戰火仍在延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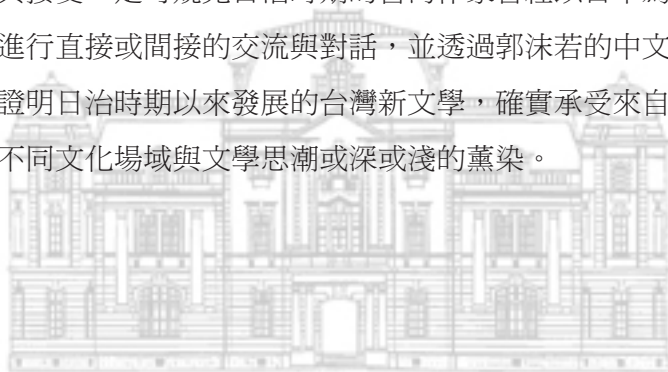
解嚴無疑對台灣文學與文化產生重大影響，全面開啟中國現代文學重新被台灣社會認識接受的新時代，也點燃了重新引介左翼文學與郭沫若文學的生機。相關出版品紛紛在台發行，各種不同的觀點也陸續湧現。郭沫若創作受到

120 郭沫若，〈「國防文學」について〉，《文學案內》2卷11號（1936.11），頁18-21。

121 有關《臺灣新文學》雜誌與《文學案內》的關係，請參考河原功著，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台北：全華科技圖書公司，2004.03），頁206-207。

選本青睞的，多數為新詩發展初期浪漫主義的詩風，顯然在中國新詩史的開創性地位獲得較多的肯定。儘管左翼作家已不再成為政治禁忌，除了創作的藝術價值未能獲得學界的普遍認同外，或許也因為在政界的作為被指責為「無恥」，以及複雜且受人詬病的異性關係，郭沫若始終未能獲得和同時代左翼作家同等的待遇。學位論文之外，迄今未見任何一本由台灣學者執筆，以郭沫若文學為範疇的學術專著在坊間流通。¹²²

總括說來，郭沫若文學在台灣의 傳播，無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擾，時而活絡，時而沉寂，郭沫若的個人形象也隨之呈現迥異的面貌——日治到戰後初期台灣作家心目中的偉大和崇高，戒嚴時期在國民黨政權之下遭到全盤的否定。相對於台灣與中國來台左翼作家，有意標舉郭沫若對抗日本侵略與蔣介石政權的左翼立場，以及反對中國內亂和重視人民大眾的呼籲；日本殖民政府與國民黨文藝派則是基於政治理念的不同，或者利用郭沫若的創作以遂行其政治目的，或者對郭沫若的文學地位與人格學養極力貶抑。藉由台灣文壇對郭沫若文學的傳播與接受，足可窺見日治時期的台灣作家曾經以日本為橋樑，與中國新文學作家進行直接或間接的交流與對話，並透過郭沫若的中文譯筆接觸世界文學名著，證明日治時期以來發展的台灣新文學，確實承受來自中國、日本與歐洲等地，不同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或深或淺的薰染。



122 江淑惠，《郭沫若之金石文字學研究》（台北：華正書局，1992.05）為目前坊間可見唯一由台灣學者執筆的郭沫若研究論著，論述範疇並非郭沫若的文學創作。該書原為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中島利郎編，《台灣新文學與魯迅》（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05）。
- 尹雪曼總編纂，《中華民國文藝史》（台北：正中書局，1975.06）。
- 余光中，《掌上雨》（台北：大林書店，1973.10）。
- 吳新榮作，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1933-1937）》（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11）。
- ，《吳新榮日記全集2（1938）》（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11）。
- ，《吳新榮日記全集3（1939）》（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06）。
- ，《吳新榮日記全集8（1945-1947）》（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08.06）。
- 吳新榮撰，呂興昌總編輯，《吳新榮選集一》（台南：台南縣文化局，1997.03）。
- 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3.08）。
- 河原功，《翻弄された台湾文学：検閲と抵抗の系譜》（日本東京：研文出版，2009.06）。
- 河原功著，莫素微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台北：全華科技圖書公司，2004.03）。
- 金達凱，《郭沫若總論——三十至八十年代中共文化活動的縮影》（台北：商務印書館，1988.09）。
- 高準，《中國大陸新詩評析（一九一六——一九七九）》（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09）。
- 張秀哲，《「勿忘台灣」落花夢》（台北：東方出版社，1947.08）。
- ，《「勿忘台灣」落花夢》（新北市：衛城出版，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3.02）。
- 張炎憲、翁佳音編，《陋巷清士——王詩琅選集》（台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11）。
- 張默、蕭蕭編，《新詩三百首》（台北：九歌出版社，1995.09）。
- 許俊雅、楊治人編，《楊守愚日記》（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12）。
- 許俊雅主編，《王昶雄全集第三冊·散文卷二》（台北：台北縣政府文化局，

2002.10)。

郭沫若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一卷》（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10）。

——，《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三卷》（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10）。

——，《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四卷》（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08）。

——，《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八卷》（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01）。

——，《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十六卷》（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10）。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1.10）。

曾健民研編，《新二二八史像——最新出土事件小說·詩·報導·評論》（台北：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03）。

黃武忠，《臺灣作家印象記》（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84.05）。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12）。

黃曼君選評編輯，《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郭沫若》（台北：海風出版社，1989.11）。

——，〈中國新文學大師名作賞析——郭沫若〉（台北：海風出版社，1994.03二版）。

黃惠禎，《左翼批判精神的鍛接：四〇年代楊達文學與思想的歷史研究》（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9.07）。

楊牧、鄭樹森編，《現代中國詩選》（台北：洪範書店，1989.02）。

楊若萍，《台灣與大陸文學關係簡史（一六五二——一九四九）》（中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03）。

楊義主編，《台灣愛國文鑒》（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03）。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出版社，1987.02）。

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台北：業強出版社，1990.03）。

龍瑛宗作，陳千武、林至潔、葉笛譯，陳萬益主編，《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五冊評論集》（台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1）。

——，〈龍瑛宗全集·中文卷·第七冊隨筆集（2）〉（台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1）。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柯喬文，〈蘭記代理有關中國與台灣文學書籍的分析〉，《文訊》256期（2007.02），頁69-73。

柳書琴，〈臺灣文學的邊緣戰鬥：跨域左翼文學運動中的旅日作家〉，《臺灣文學研究集刊》3期（2007.05），頁51-84。

高 準，〈中國新詩人出生年表〉，《書評書目》87期（1980.07），頁108-118。

——，〈中國新詩代表作選析（一）〉，《縱橫月刊》創刊號（1981.02），頁90-94。

——，〈初期及二十年代新詩選析〉，《東亞季刊》19卷1期（1987.07），頁90-132。

許俊雅，〈《洪水報》、《赤道》對中國文學作品的轉載——兼論創造社在日治台灣文壇〉，《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4期（2012.04），頁169-218。

黃曼君，〈余光中現代詩學品格論〉，《藍星詩學》10期（2001.06），頁156-172。

編輯部，〈尹雪曼小傳及作品目錄〉，《文訊》270期（2008.04），頁37-39。

蔡盛琦，〈1950年代圖書查禁之研究〉，《國史館館刊》26期（2010.12），頁75-130。

（二）學位論文

張雅惠，〈賴明弘及其作品研究〉（台北：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羅詩雲，〈郁達夫在台灣：從日治到戰後的接受過程〉（台北：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三、電子媒體

〈賴和藏書目錄〉，賴和紀念館，（來源：http://cls.hs.yzu.edu.tw/laihe/B1/b22_2.htm，2010.12.25。）

台灣文學網，國立台灣文學館，（來源：http://tln.nmtl.gov.tw/ch/m2/nmtl_w1_m2_c_2.aspx?person_number=H26010，2012.7.26。）

